

语言学经典文丛

汉语方言 地理学

[比利时] 贺登崧 著 石汝杰 岩田礼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非外借



语言学经典文丛



汉语方言 地理学

[比利时] 贺登崧 著 石汝杰 岩田礼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地理学/(比) 贺登崧著;石汝杰,岩田
礼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9
(语言学经典文丛)
ISBN 978-7-5444-8453-4

I. ①汉… II. ①贺…②石…③岩… III. ①汉语方
言-地理语言学-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6227 号



责任编辑 廖宏艳
特约编辑 徐川山
封面设计 陆 弦

汉语方言地理学

[比利时] 贺登崧 著 石汝杰 岩田礼 译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635 1/16 印张 11.5 插页 9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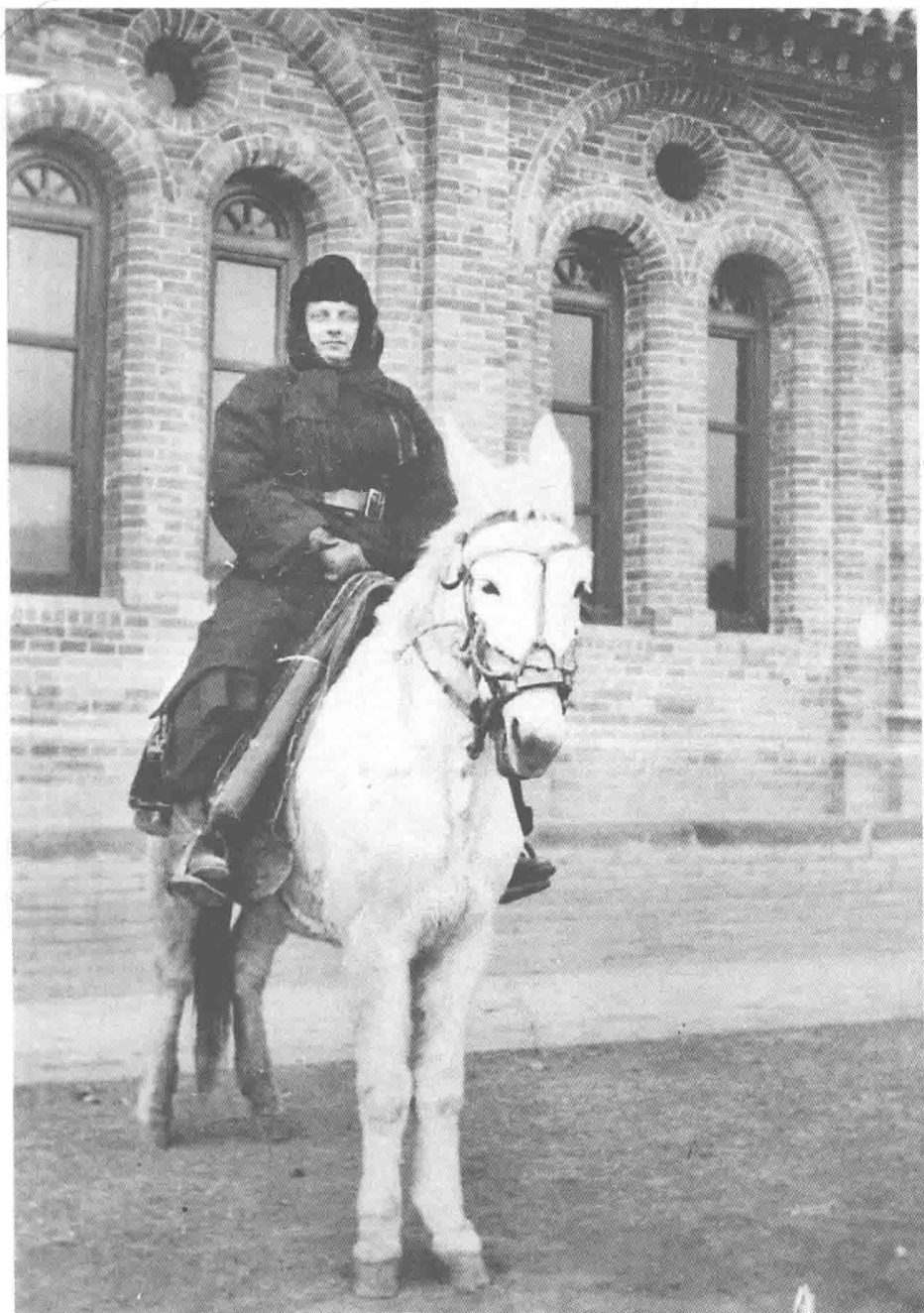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453-4/H·0289

定 价 61.00 元

审图号 GS(2012)5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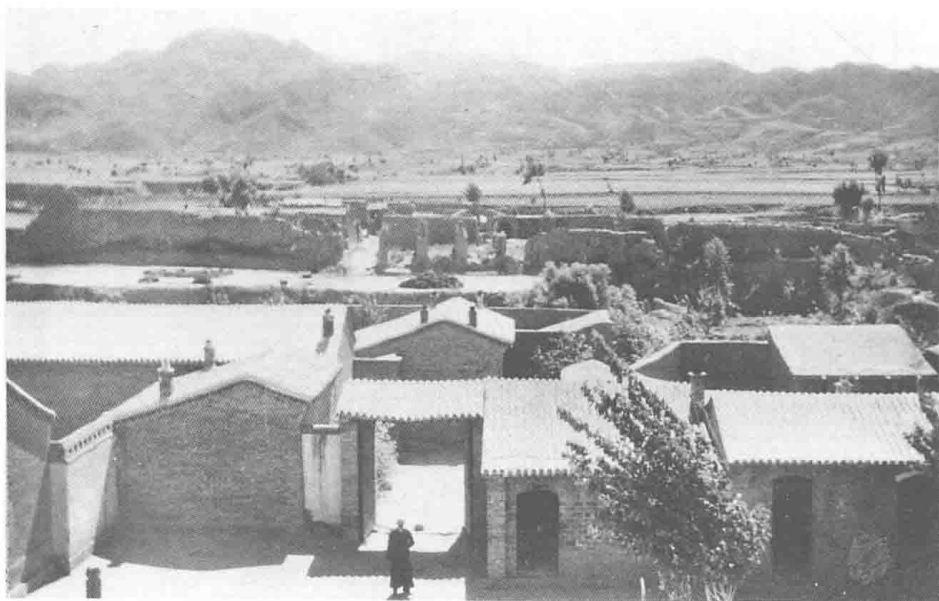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照片 1 1942年冬,作者正出发进行庙宇调查。于西册田教会前。骡子爱称为 de Witte (阿白)。



照片 2 在普济桥上。左起：作者（西册田教会第二助神父）、姚耀生（Pier Joos）神父（西册田教会主任，1910—）、王利突神父（西册田教会第一助神父，1910—1991）、葛道德神父（Michel Cattaert）（许堡教会主任神父）。



照片 3 从西册田教会（地点 J8）的屋顶眺望南山（参见作者日译本序）。左前方能看见大王村（N2）。



照片 4 全校出发远足。左端是经幢。



照片 5 徐世义(参见作者日译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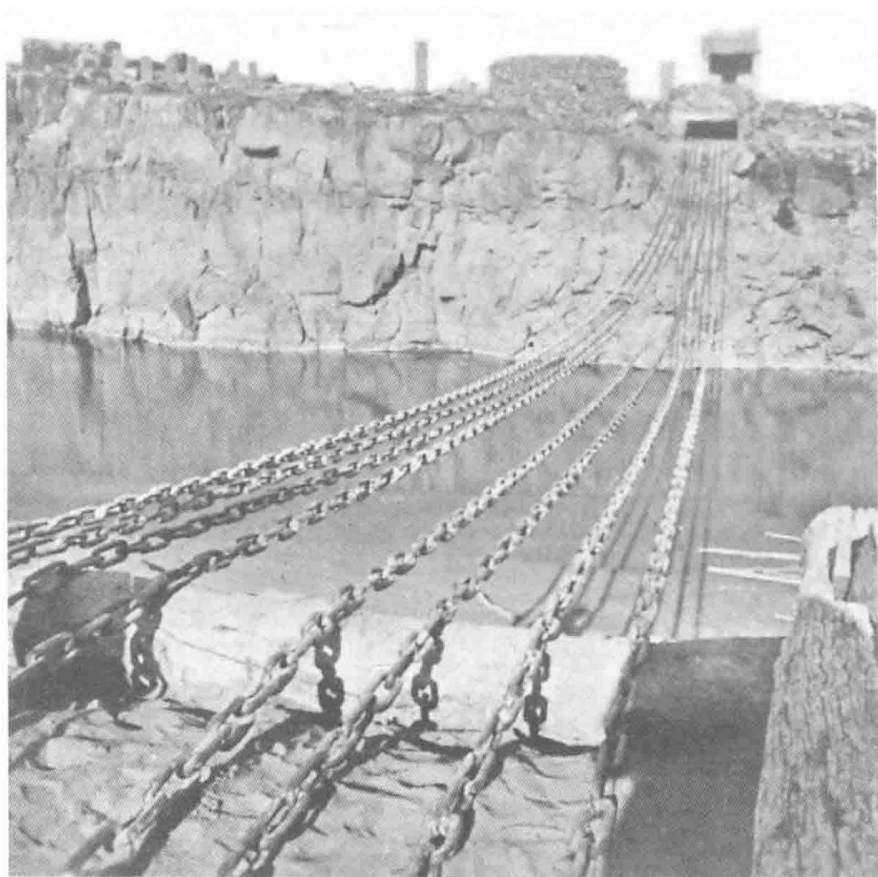
照片6 经幢



照片7 位于地点 N2 的 1341 年的墓碑。正面记载着李仲璋的业绩(参见第二章 2—2),反面记载着捐赠者名单。左侧: 小学的张老师,右侧: 王利突神父。站在墓碑前的是徐世义。



照片 8 地点 J8 的浅滩。



照片 9 架设桥板前的普济桥(参见第二章 2—2)。照片上的铁链是桥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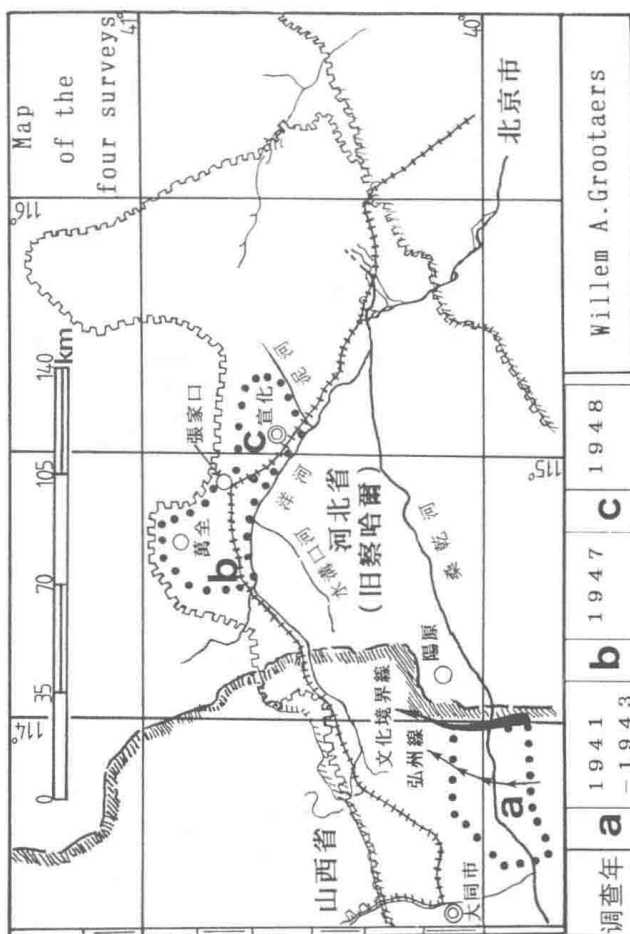
照片 10 架设后的普济桥。对岸断崖上有纪念碑。



照片 11 作者在普济桥上。

	村数	庙宇数	宗教单位数
a 大同	140	401	605
b 万全	93	592	878
c 宣化	115	361	666
宣化市	1	274	434
计	349	1628	2583

宗教单位类	a	b	c	宣化市
	22	39	42	



四次调查所及区域的整体鸟瞰图(附:民间信仰)

出版说明

上海教育出版社成立六十年来,出版了许多语言学专著,受到学界的欢迎。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从历年出版的著作中精选了一批,辑为“语言学经典文丛”。此次出版,我们按照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国家标准,对编入文丛的著作进行了体例等方面的调整,还对个别差错予以改正。其他均保持原貌。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年8月

愿方言地理学在中国开花结果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柴田武

这本译著如果早两年出版的话,这篇序就能请作者——贺登崧神父自己来写了。遗憾的是,著者已经于 1999 年以 88 岁的高寿“被神召去”了。

从 1955 年开始,贺登崧神父致力于把方言地理学移植到日本来,我则是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人。其实,贺登崧神父早在此前就在中国播下了方言地理学的种子,这本书搜集起来的的就是这些种子。

在中国播下的这些种子,可能因为处于战争中的原因,还没来得及发芽,就被埋没至今。现在,它们先被翻译成日文,又以日文本为基础出版了中文译本。我相信,这次,本书一定会惠及中国的方言学,并发芽、长叶、开花。

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早就出版了以词语为对象的《日本语言地图》(1974),按预定的计划,语法地图也即将完成。

方言地理学是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先把词、语法和发音的地域差异画在地图上,并分析其分布,构拟出一个区域的语言变化过程。这一方法是 20 世纪初在法国诞生的,到 20 世纪末,在日本已经极为普及,而到 21 世纪,将在中国发扬光大。

在朝鲜和韩国,方言地理学也将会推广开来。届时,埋藏在我心里的一个期盼也可能实现了,即规划起一个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内的远东(即东亚)地区的方言地理学。在欧洲已经展开了在欧盟(EU)范围内的方言地理学调查,这样的方言地图也正在逐步发表。能与此抗衡的就是远东地区的方言地图。

中国で開花する方言地理学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柴田 武

この翻訳がもう2年早ければ、著者のW. A. グロータース神父自身が本書への序文を書いていただろうと思う。残念ながら、著者はすでに1999年88歳で“神に召されて”いる。

私はグロータース神父が方言地理学を1955年以降日本に移植する時に関係した者である。実はそれよりも早く、グロータース神父によって中国に方言地理学の種が蒔かれていたのである。その種を拾い集めたのが本書である。

中国に蒔かれた種は、戦時中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芽を出さないで埋もれたままになっていた。それがまず日本語に訳され、その日本語から中国語に訳される。その恵みの水によって中国の方言学が今度は芽を出し、葉をつけ、花を咲かせ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ふ。

日本では国立国語研究所で、語彙を扱った『日本言語地図』6巻が早く(岩田按、1974年)完成し、文法地図もやがて完結する予定である。

方言地理学は、語や文法やアクセントの地域差を地図に描いて、その分布を分析し、その地方の言語変化を再構する方法である。20世紀の初めにフランスで誕生したこの方法は、日本では20世紀の終わりまでに十分普及し、21世紀は中国の番である。

おそらく韓国、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にも方言地理学が上陸

と思う。そうなった時の私のひそかな期待は、中国大陸、朝鮮半島、日本列島を一括した極東地域(按,東アジア地域)の方言地理学が計画されることである。ヨーロッパではすでにEU 規模の方言地理学調査が行なわれ、その方言地図も刊行中である。それに張り合う極東方言地図である。

作者日译本序

贺登崧

本书所收的各篇论文都是根据我在 1941 年 7 月到 1943 年 3 月间和 1948 年 7 月到 8 月间进行的方言调查写成的。

为了让读者能了解我为什么会到中国晋北地区工作,我要先介绍我的两段经历。

第一,是我的家庭环境。我的父母很有语言才能,母亲会法语、荷兰语和英语,父亲会荷兰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在他们的培养下,我从小会说双语(法语和荷兰语)。我 12 岁时,我父亲(Ludovic Grootaers, 1885—1956)为了调查比利时北部和荷兰的方言,在鲁汶大学创立了一个研究所,不久后,我第一次看到了方言地图,那是关于“土豆”一词的地图,这张地图是根据 300 个合作者提供的资料(通过通信调查)画成的。

第二,是我从小怀着一个宗教上的愿望,即到海外去当个传教士,这一愿望一直没让我的父母知道,直到我高中毕业时。

我开始学中文是 1932 年 10 月,当时我 21 岁。当上了传教士,我去接受体检时,他们说华北干燥的气候适合我的身体状况。从那时起,我每周上两次课,学习汉语文言。当时没让我学口语,因为有个规矩:口语必须到当地生活时才学习。这一训练持续了七年(1932—1939),其中后四年是闵宣化教授(Jos Mullie, 1886—1976)教的。闵教授当时任荷兰乌特列希特(Utrecht)大学的古代中国学教授,著有《汉语北方方言》(三卷)。* 这样,到 1939 年我赴中国工作时,学会了

* J. Mullie, C. I. C. M., *Het Chineesche Taaleigen*, 北平, Vol. I, 1930; II, 1931; III, 1933。英译本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32—1937)。译者按:本书原注用星号表示,译注用数字表示。

3 000 多个汉字,也能读中国的古典作品了。

一到北京,我就开始学习北京口语,不久就有幸师从周殿福教授(1910—1990),学习汉语语音学和方言学(个人教授)。周教授是著名的语音学家刘复(号半农,1891—1934)的弟子。

接到要去内陆地区传道的命令时,我申请去大同。当时还有一个选择是去内蒙古,那里的汉族居民全都是其他地区来的移民,方言也不纯粹。我做这一决定,是考虑到大同地区土著居民多,可以接触到纯粹的地域方言。

1941年7月我到大同市东南50公里处的西册(cái)田村(正文地图2的地点J8)。那里说的方言和北京话完全不同,当地居民听不懂我说的北京话。我马上就开始学起当地农民的话来,深入了他们的生活。那里有一个主任神父(比利时人,1910年生),还有一个年轻的中国神父(大同人,译者按:1991年11月10日去世),我和他说话时一定用本地方言(参见照片2)。我还担任了当地小学的校长。

这么一个小村庄里设立了一个大教会,还办了个小学,是为什么呢?这个区域在桑干河和南部的山区之间,有15公里宽,山区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根据地,游击队的活动频繁,所以这一地带实际上为蒙疆伪政府所放弃(参见照片3)。当时,我们和游击队的关系很好,偷偷地把药品分给他们,他们也把从短波收听到的欧洲战况告诉我们。在大一些的村子里,伪政府命令他们开办小学并任命一个校长,所以村里人在村子里的空庙门口挂上一块学校的牌子,指定一个人当教员。结果这些学校都根本没办起来,不了了之,因为当地的村民故意不送子女去那儿上学。而当地贤达却要求由天主教会来开办小学。这个学校有三个中国教师和100多个学生,一半以上的学生是住校的。因为在战争中,要维持学校,只能收很高的学费,结果每个村只收一个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儿子。

这样,我有机会每天请教周围各村的农民,并把自然的语料记录下来。带学生去远足时,也能听学生们的自然对话,趁他们不注意时记录下来(照片4)。那时发现的问题之一是:北京话“把”的作用是把宾语提到动词前,而在当地可以说“把狼来了!”,放在主语前了。两年半里,我记了43个这样的特殊句子。分析结果参见《通报》(T'oung